

第一章 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价值论

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特定称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基本性质乃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其内容来说，它应当是个丰富的、深刻的、开放的因而能启迪人们思考和智慧的理论体系。随着社会生活和实践的变化、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思维和认识能力的提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有所演变、充实，以至出现一定程度的更新，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会提出一些新的范畴，它们将经受哲学思维和时间的考验，最后或者被确认，或者被拒斥；也会形成一些新的理论，它们也将接受实践的检验和哲学家们的选择，或者被接纳为哲学体系的组成部分，或者继续游离在哲学的外围供人们思考，或者明确地归入它所应当归入的学科，或者被否定而逐渐为人们所遗忘。价值的范畴和价值的理

论现在就这样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前。

一 价值论研究在我国的勃兴

在 80 年代中国的哲学论坛上 有好几个问题成为研究者的热门话题，其中有系统、价值、文化等等，一度形成过系统热、价值热、文化热。就价值热而言，我们认为它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且产生了积极的成果。

“价值”一词 对于很多人来说 并不是陌生的。但是从哲学的高度来研究价值，探讨哲学的价值理论这件事，在我国，即使对于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和研究的哲学工作者来说，也不能不是新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从哲学上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它引起了哲学界的关注，吸引了相当的注意力，一度形成了“热点”这就不能不从社会的时代的背景和理论本身发展的内在逻辑中去寻求根源。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80 年代的中国大地上，从城市到乡村，从沿海到内地，到处在盛开色彩斑斓的改革开放之花。现在看得很清楚，中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是为了增强社会主义力量的改革。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在总结了我国近几十年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反面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党形成了一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为两个基本点、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正确路线。这条路线的制定深入人心，它的贯彻落实，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最高价值。

改革，显然是当代国际性的流潮，拒绝改革，就堵塞了

变化、发展的道路。不过，同样明显的是，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改革：它们的性质不同，目标不同和最后的结果不同。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是为了增强社会主义力量的改革。为此，首先，所有的企业都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要提高工作效率，国民经济各个部门都要解决一个效益问题，包括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工业企业要提高工业经济效益，农业部门要提高农业经济效益，所有部门还要正确处理好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坚持两条腿走路，坚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两者的兼顾。改革的基本途径就是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运用科学技术，改进管理，解决效益问题。所谓效益，实际上就是价值问题。另者，社会主义改革的目的，是要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加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满足老百姓的个人需要也好，群众的需要也好，满足社会主义祖国的社会需要也好，也包含着价值问题。再者，改革，包括着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都必须以调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为着眼点，寻找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有效体制，为此，就必须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关系，就必须妥善处理责、权、利的关系。这里，也包括着价值问题。最后，随着改革的进行，为了改革的深入，必然会引起观念的变革，有些旧观念将被抛弃，有些新观念将被确立。在观念变革中，最重要的、最根本的是价值观念的变革。哪些是有价值的，哪些是没有价值的，哪些价值大，哪些价值小，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判断不但取决于实际利害关系，还取决于人们的价值观。价值观是人们行为的激励机制和评价机制，它在每个人的观念和意识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影响着每一个人

的活动和行为。所以改革所引起的观念变革，其核心也是一个价值理论的问题。总而言之，改革的实践呼唤着从哲学上加强对价值理论的研究。

改革需要开放，改革也包括着开放，是对外开放还是封闭，这本身就是改革的重要内容。而对外开放，在外国的特别是西方的资金、科学技术、管理经验等流入我国的同时，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文学和艺术，甚至某些社会思潮都会这样那样地流入我国，对我们发生着影响。对于西方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等学术思想，必须进行具体分析、批判继承，借鉴其合理的、积极的东西，为我所用。在这一过程中，西方哲学中的价值理论，也逐步地传入了我国，西方流行的价值观逐渐地渗透到中华大地。一方面给了我们启迪，激起我们探讨价值和价值观的兴趣和热情，这主要是其中合理的积极的内容，另一方面也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方面以及共产主义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提出了挑战。这就是说，开放的实践也促进了我国哲学价值论研究的勃兴。只有通过认真的研究，批判地继承，中国的学术界才能一方面同国际学术海洋息息相通，同时体现自己的特色和发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战斗作用。所以，开放的实践为哲学价值理论的研究加重了必要性和开辟了可能性。

与此同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采取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政治方针，从根本上纠正了建国以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主导地位直至“文化大革命”时期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左”倾路线，为切实地执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供了良好的政治保证。我国学术界（包括哲学界）思想空前活跃，许多以往争论过，由于种种原因

尚未解决的老学术问题重新被提了出来，更重要的是提出了许多新的学术问题，价值理论就是其中之一。理论只有在争鸣、辩论中才能稳固地发展，因为“真理愈辩愈明”。没有活跃的学术空气，没有严肃而又自由的学术讨论，理论的生气就将日渐衰竭。在左倾路线占主导的年代，更不用说登峰造极的文革时期，我国有价值的、富有创造性的学术研究很少，其原因正在于此。十一届三中全会打破了万马齐喑的沉寂局面，为自由的研究和讨论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价值理论的提出和研究就得益于这样的学术环境。

我国哲学价值理论的研究，按照有些学者的估计，认为总的说来尚处于起步阶段^①。我们基本上同意这样的估计，其特点是：提出了哲学的价值问题，引起了哲学界的相当兴趣，就有关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讨论，形成了一批有价值的学术论文。根据我们的不完全统计，10年来，国内全国和省一级的哲学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的有关哲学价值理论（不含论述人的价值或人生价值的论文）的文章约150篇。我国对哲学价值论感兴趣，发表有关论文的，大约有95%以上都是中青年哲学工作者，因而前景和潜力是很大的，这有利于它的持久和深入。

我国的哲学价值论研究，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可以划分为几个小的阶段。

第一阶段是提出问题阶段（1980—1984年）。

哲学价值问题的提出同实践标准的讨论是有关联的。从间接的、深远的影响这一层面来看，1978年开展的“实践是

① 王玉樑主编：《价值和价值观》第5页。

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批判了两个“凡是”，极大地解放了哲学界的思想，为探讨新问题创造了良好的思想环境。哲学界需要探讨一些新问题来释放潜存的能量，他们找到了价值理论，因为它在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没有明确的地位，而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却有突出的印象；而且价值问题既有明显的实践性，又有耐人寻味的思辨性，这非常适合哲学的口味，所以它的首先提出是理所当然的。从直接的、切近的影响这一层面看。实践标准的讨论主要是重新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权威，至于理论上并没有提出什么新的论点，因此讨论结束不久，便引发了“衡量实践成败的标准是什么？”的讨论。提出这一问题的学者其用意当然是想使实践标准的讨论在理论上深化一步，因为问题是明摆着的：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意味着只有用实践及其结果才能检验一种认识（或理论）是真理还是谬误。一般来说，成功的实践结果证明认识的真理性，失败的结果证明人的认识的失误；既然如此，又应当用什么来检验或衡量实践的成败呢？这一问题的提出，初看起来似乎浅薄得很，推进不了对实践的研究。其实不然，讨论下来出现了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实践目的的实现程度是衡量实践成败的标准，或者说实践的结果是否达到预期的目的是衡量其成败的标准。更具体地说，他们认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是我们最高的目的，可以用它的实现程度来衡量我们实践的成败得失。第二种意见明确反对第一种意见，并认为它用主观目的的框框去裁剪实践和历史，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他们主张应以是否符合客观规律为标准来判断实践的成败，并指出：“判断实践的成败究

竟是以符合客观规律为标准，还是以符合人的实践目的为标准，这是根本对立的两条认识路线。”^①第三种意见认为，社会需要是否得到满足以及满足的程度，是衡量实践成败的客观尺度。三种意见中，除第二种外，都涉及到价值理论的问题，所以有关论文已经指出：人必须从两方面把握对象，一是把握物的固有属性，二是把握物满足人需要的属性即价值，才能正确地确定实践目的并进行改造对象的实践活动。

真理标准的讨论引发了价值理论的研究，而作为这一研究真正开始的标志是上海的《学术月刊》1980年第10期发表了杜汝辑同志的文章《马克思主义论事实的认识和价值的认识及其联系》。该文首次明确提出：对社会事物的认识有事实认识和价值认识之分，前者是关于事物“是如何”的认识，后者是关于事物“应如何”的认识，表现为关于事物是好或坏、善或恶、正当和不正当、合理和不合理的评价。文章列举了大量例子论证了事实认识与价值认识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把它们割裂开来或混同起来都是错误的，前一种错误会导致唯心主义先验论，后一种错误会导致实用主义。文章还提出，社会实践作为对社会事物认识是否真理的检验标准不论对事实认识和价值认识都是适用的。这篇文章虽然将事实认识和价值认识的区分限制在社会事物的领域，对它的普遍性估计不足，但它的历史功绩在于首次明确地提出了哲学的价值问题（当然还限于认识论领域），因而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1981年8月8日，《光明日报》发表《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一文，肯定杜文提出的问题值得研究，并

① 《中国哲学年鉴·1983年》第51页。

认为价值问题的提出为当时《光明日报》等报刊正在讨论的“衡量实践成败的标准是什么？”的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把钥匙。《光明日报》的这篇评论文章在理论上的敏感性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这种敏感性表现在，它热烈地肯定了研究价值问题的意义并正确地指出了价值问题的探讨同实践本身的评价标准问题有着内在的联系。

自此以后，价值问题的研究在我国逐步开展起来。《哲学研究》、《光明日报》、《国内哲学动态》等报刊相继发表了一些研究文章。这一阶段总的特点是：提出了问题，初步引起了哲学界的注意，为下个阶段的第一次讨论高潮准备了条件。

第二阶段，1985—1986 年，这是哲学价值论开展热烈讨论并取得较丰富成果的两年。

1985 年 5 月，在安徽省屯溪市召开的全国真理问题讨论会上，在着重讨论客观真理、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关系，以及真理是不是多元的同时，提出了真理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并作了初步的讨论。中国人民大学的李德顺同志作了主要发言，他提交的文章《真理与价值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则》，后来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同年第 3 期上。讨论虽然是初步的，但由于问题新鲜，加上出席这次讨论会的人很多，所以影响不小，对于哲学价值论的研究，有不小的推动作用。

随后在 1985 年的秋冬之季，《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人文杂志》等相继刊发表多篇文章。《哲学研究》在发表袁贵仁的《论价值真理概念的科学性》和薛克诚的《客观真理刍议——兼评价值真理》时，还加了编者按，

并决定开辟“关于真理与价值问题”的讨论专栏。我国最高级哲学刊物《哲学研究》的介入标志着哲学的价值问题受到了哲学界的高度而广泛的关注，《哲学研究》专栏的开辟又极大地推动了研究的展开，虽然这一专栏还限于从真理的角度或更广泛地从认识论的角度提出价值问题。随后，《哲学研究》的这一专栏又连续发表文章，有的就价值真理问题作出分析，有的实际上已突破了上述狭小视角而从一般价值理论的方位考察哲学的价值概念的内涵及形式问题。本书作者之一也曾发表《论价值属性》一文^①，提出了本体属性价值化、正负价值的区分及价值计量等问题和相应论点，受到了学术界的注意。

《哲学研究》专栏的开辟，有力地推动了哲学价值论研究的开展，1986年《哲学研究》、《哲学动态》、《江汉论坛》、《人文杂志》等都连续发表讨论文章。在这一基础上，由《哲学研究》编辑部和杭州大学哲学系发起并组织，于1986年5月在杭州召开了“认识与价值”学术讨论会，使哲学价值理论的讨论第一次达到高潮。这次讨论会着重对价值问题进行哲学概括，对价值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价值范畴的内涵、价值与认识、价值与真理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次讨论会对我国哲学价值论的研究无论在深度与广度上都向前推进了一步。^②

第三阶段，1987年以后，哲学价值论处于进一步研究阶

马志政：《论价值属性》，《哲学研究》1986年第1期，见本书附录。

② 参见王玉樑主编：《价值与价值观》第6～7页。

段。

这一阶段的价值论研究，一方面是比较前一时期的深入了，这种深入表现在：其一，是对价值论的研究现状作了反思，从而进行了关于“普遍价值定义”的讨论，郝晓光在《光明日报》（1987.1.5）和《江汉论坛》发表《对所谓普遍价值定义的否定》等文章，对近几年价值论研究中不少文章作为立论根据的马克思在《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的话“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提出否定，指出这不是马克思的论点，而是受到马克思批评的瓦格纳的论点。由此引起了讨论，讨论涉及到以下的问题：对马克思的话如何理解？对价值的这一定义即使是瓦格纳的论点是否一定错了？普遍的价值定义到底有没有根据？能否在使用价值的意义上规定哲学价值范畴？等等。其二是价值观及其变革问题开始受到了人们的关注。价值观是哲学价值理论中十分重要并且最富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又首当其冲地面临着剧烈的变化。对价值观的关注、研究，对价值观的合理变革给予指导，是理所当然和十分迫切的。自1987年始，探讨价值观的论文有所增加，这年的11月份，在西安举行了“价值论与价值观念变革”学术讨论会。价值论研究有所深入的以上两个方面，在这次会议上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反映。这次讨论会的成果收集在王玉樑同志主编的《价值和价值观》这本论文集中。另外，中日两国哲学家曾就若干哲学问题举行了一次讨论会，其中一个就是价值观念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李德顺作了题为《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价值观》的主题发言，指出“价值观念”是一个内涵丰富、

延广泛的哲学范畴，是人们的价值生活的知识和经验在头脑中的积淀，是有关价值和价值关系的观念系统，它起着指导人们的价值活动，调节和控制人们的情绪、意志和态度的作用，它是社会意识形态的特殊内容和核心。至于价值观念的具体内容，李德顺概括了社会秩序、信念等五个方面。日本哲学家在发言中表示，日本对价值观念的研究没有深入进行，他们对中国哲学界对价值观念的探讨以及当前中国的价值观变化很感兴趣^①。最后，特别应当指出，这一阶段的重要成果是李德顺的《价值论——一种主体性的研究》一书的出版。这可以说是我国哲学价值论研究的第一部也是迄今最有价值的一部学术专著^②。它肯定有助于我国哲学价值论研究的深入、系统地进行。

但是另一方面，尤其是现在，价值论研究也面临着难以深入的局面。该提出的问题提了，能写的文章写了，目下似乎难以深入。从什么方向去研究？找到什么突破口？在理论上达到怎样的目标？都需要好好思考。我们想，同任何东西的发展一样，理论上的建树和发展也不是直线进行的，而是曲折前进的。现在似乎需要一个消化与深思的时期。

十年来价值论研究在我国勃兴的事实，为我们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价值论显示了客观的社会需要和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料。我们要立足于自身国度。我们也要借鉴西方的或东方的哲学界在价值理论的研究中所提出的问题和形成的理论观点，因为正确的有价值的哲学思想，是人类的精神财富，

见《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

② 该书于1987年9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①

二 借鉴国外的哲学价值理论

在建立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适合我国具体实际的哲学价值理论的过程中，借鉴国外的哲学价值论是十分必要的。在哲学上如同在文化上一样，每一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也有它的短处，它们各自作出了贡献，也有着许多没有探讨清楚甚至尚未涉及的问题。当今处在开放、交流的时代，国与国之间在文化、哲学、思想上互相传播、互相影响，为这种借鉴加强了必要性并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哲学理论虽然是有阶级性的，但那些深刻的、启发人们思考的具有真理性的理论，同样是世界性的宝贵精神财富。而那些错误的理论，也在不可避免地流传并对我们发生着现实的影响，我们同样十分需要弄清楚它的失误在何处以及它的思维教训在哪里。这两者都构成了我们所讲的借鉴。借鉴就是批判地继承。

（一）西方哲学中的价值论

价值论 (axiology)，又译为价值学，它由两个希腊语词axios和logos（前者意为有价值的，后者意为科学组合、演变而成）。《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在“axiology”这一词条下的解释是：“对于最为广义的善或价值的哲学研究。它的重要性在于：（1）扩充了价值一词的意义；（2）对于经济、道德、美学以至逻辑方面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提供了统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348页。

一的研究，这些问题以往常常是被孤立开来考虑的。①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解释大体上是正确的。价值理论在西方哲学中并非一开始就是独立的哲学理论。价值一词在日常生活和通常的评价活动中有着广泛的应用，我们中国人就如此。譬如我们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说法：“这件作品很有价值”、“干这件事有意义、有价值”、“这个主意不坏，看来很有价值”、“你的高谈阔论毫无价值”等等，我们相信西方人也如此，在日常活动中，对价值并不陌生。价值作为科学上的一个专门概念最初是经济学上的事情，譬如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等，在亚当·斯密的著作中就有了这样的提法。在古代，例如在古希腊，价值一词还不是一个哲学概念。古典西方哲学在谈论价值问题时，一般都使用有用还是没用、有利还是有害、好还是不好、善还是恶、美还是丑、正义还是非正义等等具体的价值词，那时还没有运用价值这一通名。柏拉图认为早期智者就已经认识到物的价值属性是相对的，他在回答苏格拉底关于好的（善的）是否就是有利的问题时说道：

我知道许多东西——肉、酒、药物和上万个别的事物，有的对人有利；有的对人既无利亦无不利，只是对马有利；有的只对牛有利，有的仅对狗有利；有的对动物无利，仅对树木有利；有的（例如肥料）有利于树根，却无利于树枝；……我还可以举橄榄油为例，用于植物，简直是灾难，用于动物的头发，一般说来也是有害的，但对于人的头

发，人的身体却是有利的。即使是用于人，它对人的表皮有利，对于内脏却是有害的。因此，除了少量作为内服药外，医生总是禁止病人食用这种油。①

柏拉图的这一段话，涉及的是价值问题，当然是其中一项具体的价值（有利还是无利甚至有害）问题，因而没有使用更概括的价值一词。西方哲学中从古希腊到近代，虽然价值论因素早已有，但价值论本身还没有从“效用论”、“善恶论”、“美丑论”、“正义论”等等具体理论中概括出来形成统率它们的一般理论，当然也没有成为哲学中相对独立的理论部分。

价值论成为相对独立的哲学理论是近代晚期的事情，大约已经有了一百年的时间。这是同价值一词逐渐成为一个哲学概念分不开的。在古希腊，价值还没有成为哲学范畴。亚里斯多德曾经提出十类哲学范畴（本质、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势、状态、活动、遭受），认为对于一件东西的认识，形成一个命题，最后都要落在这些范畴之一里面②。亚氏提出的十类范畴，适用的范围是那么广，以至认为对于任何一件东西下判断，都必定要落实到其中一个上面，即便这样，亚氏也没有提出价值这一范畴。

根据我们掌握的一鳞半爪的资料，希腊哲学家中，最早使用价值概念的要算斯多葛派的哲人塞内卡（*Lucius Annaeus Seneca*，公元 2—65 年）他在其著作《论幸福的

柏拉图：《普罗塔哥拉》。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第 153 页

生活》中说：

我们要寻求一种真正的“好”，不是表面上的好；它是纯粹的、始终如一的，它的深处隐着它的价值。这样一种“好”是值得我们追寻的。它并不在远处。我们会找到它的。①

这段话表明，在塞内卡看来，价值是隐藏在事物深处使它成为真正的好而值得我们去追求的东西。塞内卡这里使用“价值”一词，已经不是表示某种具体的价值判断的溢美之词，而是表示“真正的好”的内在根据，所以我们有理由将它看作是已经上升为价值范畴，虽然塞内卡并没有对“价值”的内涵作更多的规定。

往后，教父哲学的典型代表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 354—430）在赞美上帝的全能和至善时，谈到了价值。在他看来，在宇宙中，恶和善都有价值，当然，“善若和恶比较，就显出更有价值，更可羡慕”。恶为什么也有价值呢？因为“那所谓恶，只要能够加以控制，使它处于所应处之地，也能增加我们对于善的景仰”，而且“上帝能从恶事中结出善果来”，否则上帝决不会让任何恶存在于他的事业中②。这可算是一种独特的基督教价值观。

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科学家哲学家布鲁诺用朴素辩证的观点观察事物和人生，抹杀了事物质的规定性和相对的稳定性，竟然得出了否定的价值观。布鲁诺在《英雄的热情》一文中写道：

①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第189页。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第220页。

明智的人是活着的人，是观察和解事的人，明智的人视察善和恶，是把善或恶评价为变化着的事物，处于运动、变化和转变……中的事物，他不茫然无措，也不骄傲自满，而是喜爱有节，欲念有度的。因此，对他说来，快乐并非快乐，因为他在现在就看到它的尽头。同样，苦难对他说来，也不是苦难，因为他借思辨的力量，即使在现在就已看到它的终结；因此，明智的人就在变化中静观万物，把万物看作已不存在的事物，并且断言，万物都是无价值的，不足轻重的。^①

布鲁诺从万物的变化中看到它们灭亡的命运，看到非存在的必然趋势，固然有着辩证法的因素，但他由此得出了否定的价值观，未免失之偏颇。他所理解的价值，不是事物对于人类主体的关系范畴，而是事物存在与否意义上的概念，似乎也不妥当。

在近代哲学中，笛卡儿和康德使用过价值的概念。笛卡儿曾提到，要按照正义的价值来评价善与恶及有利与不利，康德也多次使用过价值、绝对价值这样的概念^②。康德还明确提出人的整个认识可以划分为事实认识和价值认识两个基本层次。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把知识分为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两种，前者是认知存在者（事物）是什么的知识，后者是认知应存在者是什么的知识。不过显然在他们那里价

《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第 429～430 页。

刘继：《现代西方价值论概述》，《价值与价值观念》第

值的概念还没有成为明确的、重要的哲学概念。

使价值成为一个重要概念方面，19世纪后半期的两个哲学家洛采和尼采起过不小的作用。洛采（*Rudolf Hermann Lotze*, 1817—1881）是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早期新康德主义者，他自称其哲学为“目的论的唯心主义”。他的观点反映了部分西方哲学家在古典哲学衰落之后，试图到价值领域中去重新寻找出路的倾向，他把世界划分为事实、普遍规律和价值三大领域，认为只有价值是目的，其他两者都是手段。他还认为概念的真理性的真理性就在于它是否有价值。这样，洛采把价值提到哲学的中心地位，由此引发了一个价值哲学流派，即新康德主义的弗赖堡学派。尼采（1844—1900）是权力意志主义的祖师爷，他提出了“重估一切价值”的主张。他认为正义、善良、同情、仁慈、爱等等传统的价值观念是弱者的价值观，它们是弱者为了免受强者的侵犯，伺机改变地位以欺凌强者而制造出来的诡计，它们抑制了权力意志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化。尼采主张彻底抛弃一切弱者的传统价值观，另立鼓励侵犯、崇尚奴役的强者的、权力意志主义的价值观。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有着强烈的政治倾向和明显的社会效应，不过倒提醒人们价值问题的重要，正确估计价值的重要，客观上有利于价值理论的研究。尼采在西方掀起了一场重新反省自己的文化、反省价值观、价值标准和价值理想的运动，这就把“价值”提到哲学的高度，突出了价值问题的重要。洛采和尼采两人感兴趣的并不是某种具体的价值问题，而是力图建立新的价值观和探讨哲学层次的价值问题。所以有的学者将他们二人看作是创立哲学价值论的先驱不是没有道理的，因而西方的哲学价值论大致在19世